

从“霞飞坊”59号巴金、萧珊家出发,步行30分钟约2.1公里,可到建国西路506弄懿园31号“合肥张氏四姐妹”大小姐张元和家。

沈从文只身赴北平任北大教授之后,夫人张兆和离开苏州娘家,带着孩子暂住上海大姐家。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与师母“三姐”亲如家人。沈从文生前身后,张兆和与“贤契”汪曾祺一直来往密切。1946年8月汪曾祺初到上海,尚未找到致远中学的工作,一度情绪低落,险些自杀。沈从文不仅自己从北平写信勉励汪曾祺,还叫夫人张兆和从苏州给汪曾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这位敏感脆弱、在上海迷茫失措的年轻作家。

张兆和带着孩子借住上海“张大小姐”家期间,汪曾祺与沈从文书信往来频繁。北方报刊发表汪曾祺文稿,绝大多数仍由沈从文经手。不管汪曾祺有没有去过“懿园”拜访“三姐”,同在上海的“三姐”和丈夫的这位爱徒应该息息相通。

二从致远出发,往北穿过相隔不远的两条横马路即大沽路、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便到了繁华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南京路(今南京东路)。

这个方向与汪曾祺关系最密切的首先是李健吾家。从致远或紧邻的文生社出发,沿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往西走到威海卫路/西摩路口,或者沿成都北路往北行至威海卫路,再往西走到西摩路口,两条路线步行到李健吾家均只需一刻钟。

抗战胜利后李健吾从姚主教路(今天平路)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75弄华业公寓(与威海卫路交

“懿园”·“华业公寓”·“庙弄”·“愚园新邨”——“汪曾祺在上海”之五

郁元宝

界),跟致远中学及其近邻文生社、霞飞坊巴金家恰成三足鼎立之势。

汪曾祺可能不会像青年文友、浙江大学外文系学生唐湜那样,每个周末都以私淑弟子身份去李健吾家请益。但汪曾祺在巴金家经常见到李健吾。这位生性豪爽的文坛前辈不仅介绍汪曾祺去自己学生高宗靖创办的致远中学教书,还在他与郑振铎联合主编的战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办的唯一大型文学期刊《文艺复兴》上接连发表了汪曾祺三篇重要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老鲁》。听说汪曾祺喜欢京剧,跟自己有同好,李健吾还专门赠票给这位文坛新人,邀他去静安寺路派克路口(今黄河路21号延安西路口)“卡尔登大戏院”,一道欣赏京剧“十大名牌”的表演。1982年汪曾祺在给李健吾的信中说,“您在‘卡尔登’门口等我,我现在还记得您当时的样子。”

诗人和评论家唐湜正是在华业公寓李健吾家,得知他心仪已久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已到上海,正执教于李健吾弟子高宗靖任校长的私立致远中学,就立刻拿着李健吾的介绍信找到致远中学,与高宗靖、汪曾祺一见如故。

三1946年5月1日《文艺复兴》一卷四期发表《复仇》,郑振铎在“编后”向读者隆重介绍当时尚在昆明近郊“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汪曾祺先生”,令汪曾祺终生难忘。经黄永玉介绍,汪曾祺认识了《文艺复

兴》唯一的青年编务阿湛(作家王湛贤)。不知汪曾祺可曾跟阿湛一道去过愚园路东庙弄44号郑振铎家,但汪曾祺对紧挨着静安寺的东、西庙弄再熟悉不过了。1946年8月初到上海,尚未寻到工作之前,他就一度借住于老同学朱德熙在庙弄的“本家老屋”。

无巧不成书,致远中学校长高宗靖家就在距庙弄不远的愚园路750弄“愚园新邨”,唐湜的舅父王国桐(“南强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也住在这里。唐湜每个周末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总是先在舅父家安顿下来,再四处活动,以文会友,拜访先后集结在《诗创造》《中国新诗》周围的青年诗友,以及李健吾、汪曾祺等,并由此在1948年2月率先写出第一篇评论汪曾祺的专文《虔诚的纳粹思——谈汪曾祺的小说》。

如果汪曾祺来静安寺“庙弄”,可以同时探望朱德熙家人、高宗靖校长、郑振铎、借住在舅父家的唐湜。

四《受戒》开头说“明海”的家乡“出和尚”,“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1939年夏,高中生汪曾祺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第一次出门远行,就幸亏有个高邮籍的静安寺和尚一路陪同,这才从家乡顺利地到达大上海。时隔七八年,该僧人若还安然无恙,汪曾祺每次来静安寺“庙弄”或附近的“愚园新邨”,应该也会顺道拜访他的吧?

1946年10月6日(星期日),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公祭闻一多、李公朴。致远中学教员汪曾祺不仅路近,时间也不冲突。在公祭的人群中,他会不会再次见到这位来自家乡的和尚呢?

最近中的最远处

——夜读语文课
张大文

伏在大门口饥寒交迫,张妈把它捡进来喂养。大家并不喜欢,见它常常凝望着鸟笼里的一对芙蓉鸟,便多加留心。不料有一天张妈说死了一只鸟,一条腿被咬去了。大家断定是这只猫所为,“我”便拿起木棒追打,它逃到自家屋瓦上,却不逃到邻家的屋脊上去。

隔了几天,只见一只黑猫又来吃鸟,“我”才觉得冤枉了花白猫。两个月后,它竟死在邻家的屋脊上了:它对主人是有感情的,但因为主人讨厌它,就不敢死在自家,即使是自家屋瓦也不敢;但又不肯死在看不到自家主人的地方,所以只能死在目力所及的最

时间过得快,转眼,小莲已经走了6年了。最后一次见到小莲是在瑞峰酒店公寓,她去世的两个月前。她在上海没有自己的房子,之前租住在静安区的一个小单位,里面的很多家具像床、书桌之类都是棚里的道具让师傅改装的。

小莲对画面、文字精益求精,但是对物质完全没有追求,脚下一双走南闯北哥伦比亚的登山鞋已经算是贵的了。她最喜欢穿的一条哥伦比亚的速干运动裤,居然还是到蒙特利尔探朋友时,去救世军的旧货店里买的二手货。我说你不会去专卖店买一条? 至于要去旧货店买嘛! 她说这有什么,裤子这么新,才三块加币,专卖店怎么也得一百多,再说还不见得有我喜欢的款式。这条裤子有很多口袋,前前后后,两条腿的侧面,她穿上就是导演的样子。

小莲就是这样,她对吃也不讲究。我们每次在外面吃饭,剩下的哪怕是一点点汤水酱汁她都要打包,说明天中午放棵青菜,半碗剩饭就是菜泡饭了。她虽然祖籍湖南,但在上海长大,就喜欢吃饭泡饭。

我去看她的时候,其实她除了吃药止痛,已经不太能吃东西了。她小小的身体缩在沙发里显得头又重又大,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她的眼睛依然

郑振铎的散文《猫》,收入部编初中七年级语文书。

散文写一只花白猫死在邻家的屋脊上,即死在自家最近范围内的最远处,是有道理的。这只猫起初蜷伏在大门口饥寒交迫,张妈把它捡进来喂养。大家并不喜欢,见它常常凝望着鸟笼里的一对芙蓉鸟,便多加留心。不料有一天张妈说死了一只鸟,一条腿被咬去了。大家断定是这只猫所为,“我”便拿起木棒追打,它逃到自家屋瓦上,却不逃到邻家的屋脊上去。

这就是“自此,我家永不养猫”以自惩的道理所在。

我和张东风相识于1983年秋。那时我在解放军报社驻空军记者站帮助工作,他在新华社驻空军记者站帮助工作。美其名曰帮助工作,实际就是跟着老师下部队采访,学习写新闻稿。

我跟着站长刘从礼,他跟站长蔡善武,两位站长都是军界大名鼎鼎的记者。两家记者站的办公地点都设在空军机关办公大楼四层的最东头,斜对门。

单身青年,二十啷当岁,都住办公室。我睡一张正儿八经的单人床,有铺有盖。东风支一张铁网折叠床,白天立起来,晚上拉开。我俩都从兰空那边过来,都是陕西人,都在空政干部食堂吃饭,早不见晚见,自然而然熟悉起来。我正式调到记者站不久,离开空军大院,调整到军报社要闻快讯处当编辑。东风回十六航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任命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处宣传干事。再次聚首北京,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平时打交道比较多。空军大院离军报社八九公里路,东风骑着个自行车过来送稿时,经常会到我办公室站一会儿,说几句话。如果是我负责的宣传内容,我俩会沟通协商稿件编

有神。我轻轻地抱了抱她,怕弄痛她,她只剩下一把骨头。她说她在修改遗嘱,让我自己去书架上找她要给我的书。她说办理好遗嘱就心定了,每天都有个按摩师来给她按摩缓解疼痛,其他的时间就是看

小莲

方海伦

书写文章,写文章时能够分散注意力,就不会觉得那么痛。不然坐吃等死,每次吃饭都要跟自己斗争很久。小莲的癌症扩散后,吃饭吞咽都困难。

我紧挨着她边上的沙发坐下,怕离得远她说话费劲。她从身后拿出一条真丝围巾给我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中青年画家手绘的限量版真丝围巾,给你留个纪念。我接过丝巾,心里直打颤,怕自己要哭出来,就说,说话耗神,你好好休息吧! 我回去了,下次再来看你。

她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我又抱了抱她。她在 my 耳边轻声说:你去年做了两个手术,自己要多保重。我拼命点头,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第二天,我回了香港。回香港后,小莲偶尔还发微信给我,后来就一直很安静,再后来,就是噩耗。

小莲并不是一个一下子会让人喜欢上的人,她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都不太好。她说话直来直去,比如她会说我皮肤黑,一点都不会像上海人,我只好听南中国海的风吹多了。她也经常爆粗口,给学生上课时,学生交头接耳,她就会骂上去。她毕竟是癌症患者,容易疲劳,下面讲话,她就不得不提高嗓门。这也与她的职业有关,她常说,在片场就是一个男人婆,就得一副野蛮做派才镇得住,否则大家都磨洋工,每天烧钱超支了怎么办?

她也容易情绪激动,有一次,一桌子人吃饭,小莲说起她的书里写到的一个人物的苦难,号啕大哭,大家都被吓到,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其实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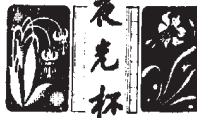
她经历的人就会理解,她自己有太多的苦难,说起他人的苦难才感同身受。

我一直认为小莲有点怀才不遇,她跟我说当年在纽约大学读书,很多穷艺术家生在纽约摸爬滚打的时候大家都很亲近。李安得奖后,她曾打过电话给李安祝贺他,说等回纽约了大家聚一聚。当时李安在电话里说了一些客套话,小莲马上感受到了疏离。那个电话后,她再也没有跟他联系过。小莲拥有纽约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说很好的英文,或许是她极度敏感的性格使然,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大放异彩的机会,或者说她没有特别积极地寻找这样的机会。

小莲的才华有目共睹,不但能导,还能写,我甚至觉得她的文字比她的电影更打动我。她曾经把自己癌症治疗期间的经历写进了一个中篇,她的笔触冷静又温暖,你能感受到她的苦难,但你能感受到她没有哀怨,所有的苦难她都在坦然面对。

小莲的癌症复发后,在治疗期间微信我:“柳医生让我住院,怕我跑来跑去太累。其实,放疗每次就10分钟左右,病房呆23小时,我还是回宾馆,这是居家旅馆,90平方米,客厅就有40平方米,大沙发,有人打扫。我是想在好一点环境里写作。我想我还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那点小钱用光算数。我会积极配合治疗的……我只要人不会变得太笨,放疗就放疗了。我估计能打过今年就不错了……我现在抓紧写多少算多少,周四开完会诊,我去烈士陵园,我父母的骨灰在那里是终身置放的,我带朋友一起去看父母,然后告诉朋友,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哪棵树下,离开我父母近一点,小时候没有和父亲在一起,死了就靠近他们一点吧!”

我留着她的微信,每次看到这一段总要泪目。



发或如何修改等问题。东风性情耿直,虽是师级干部子弟,但为人处世并不张扬,我很愿意和他交往,我俩逐渐成为互相信任可以直抒胸臆的好哥们。

我和东风上世纪80年代末脚前脚后结婚。东风在感情上的专一,也让我肃然起敬。他调来北京前,刚刚认识了兰州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的女儿王采婷,但尚未明确恋爱关系。东风家庭条件

好,长得帅,又有重点大学学历,空军大院给他介绍对象的大有人在。面对种种诱惑,面对两地分居等种种困难,他坚持选择了王采婷,一直到孩子好几岁才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东风从空军转业后,被选为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办公室的文字秘书,这期间不方便打扰,我们偶尔会通一两次电话,有极少的一两次见面。谁能料到,今年我与东风的见面,竟然是在一个让人伤感落泪的场合。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不见的张东风茫然地看着我。我心里涌起说不出的难过和辛酸。“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我的好兄弟,期盼你能等到战胜疾病的那一天。



荷漪园 (扇面) 李守白 作

齐白石九十岁那年翻出七十岁时的画稿阅读,说:“我年轻时画得多好!”我曾经和一个四岁多的男孩子聊天,问他还玩泥巴吗? 还爱在爸爸的脸上画胡子吗? 他想了一阵,说:“不了,小时候喜欢过。”我知道,他的“小时候”指的是三岁那年,因为我亲眼所见。这一老一少,对“年轻”有独特的界定。更准确地说,我们所回望,所向往的是童年。

“孩童是人类之父。”——大诗人华兹华斯这般宣告。今天,我实实在在地验证了这不朽的诗句。和老伴去看望儿子一家。没见到他们一家四口好几个月了。两个孙子,大的叫J,快10岁,小的叫H,四岁多。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室里有数百件玩具,都是男孩子喜欢的。地上摆着四个一英尺见方的“格子”,都带围栏,里面摆满了车子、房子、工具,各有讲究,可看作电影工厂的迷你“片场”。我问J,谁摆的,这么漂亮? 他得意地说:“我摆的,但主意是弟弟出的。”这么说来,弟弟是参谋长,哥哥是司令。我问他们,爷爷当小兵,和你们一起摆怎么样? 他们批准了。

我俯伏在地板上,双肘支腮,提出建议:布置